全球五分之一人口的贡献*

——中国经济发展的世界意义

蔡　昉

【内容提要】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中国经济走上独立自主的发展道路,分别在不同阶段上进行了艰辛的探索,积累了成功的经验和有益的教训,最终在改革开放条件下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在前30年经济建设的基础上,后40年的改革开放逐步消除了计划经济的体制弊端,形成市场经济下的有效激励机制,推动资源重新配置,全方位参与世界经济分工,创造了史无前例的发展奇迹,也对世界经济发展做出了显著的贡献。首先,中国经济以同期世界上最快的增长速度以及不断扩大的总规模,发挥了世界经济发动机和稳定器的作用。其次,占世界人口五分之一的中国人民的成功实践,为广大发展中国家提供了弥足珍贵的经验分享与智慧借鉴。最后,中国经济探索中所体现的具有共性的发展规律,以及把一般规律与特殊国情相结合的方法论,为修正、丰富和创新经济理论提供了有益的素材,尤其有助于推动发展经济学的复兴。面向"两个一百年"目标,中国经济正在从中等偏上收入阶段迈向高收入阶段,更高水平的改革开放不仅是保持可持续发展的关键,还将对世界做出更大的贡献。

【关键词】　中国经济;世界意义;发展奇迹;发展经济学

【作者简介】　蔡昉,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北京　邮编:100732)

【中图分类号】　D81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6-9550(2019)06-0004-15

* 感谢《世界经济与政治》杂志匿名审稿人的意见和建议,文中疏漏由笔者承担。

一 引言

在 21 世纪第二个十年结束之际,中国经济发展取得的成就得到全世界的瞩目。今日中国在全球经济的重要地位,既来自过去 40 年的改革开放,也离不开改革开放之前 30 年的探索。1949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改变了中国经济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性质,使中国走上独立自主发展的道路。从新中国成立到 20 世纪 70 年代末,中国的经济建设得到恢复,人民得以安居乐业。随着死亡率大幅度下降,人口转变从高出生率、高死亡率和低自然增长率的第一阶段,进入高出生率、低死亡率和高自然增长率的第二阶段,这也是改革开放以后在向低出生率、低死亡率和低自然增长率转变过程中,经济增长收获人口红利的一个必经阶段。

前 30 年建立起的完整工业体系,奠定了改革开放期间进行产业结构调整、获得资源重新配置效率的起点。新中国成立之后,中国的工业化战略就确定为重工业优先发展。当时,实施这一战略有其特定历史条件下的合理性。西方国家的封锁形成诸多发展瓶颈,必须靠优先发展重工业来打破。例如,作为一个不可或缺却被卡了脖子的战略性产业,石油业依靠自力更生实现了自给自足。在当时的环境下这既是不得已而为之,也是不可不为。与此类似的还有化学工业、电子工业、核工业和航天工业。这些产业正是由于被赋予了更高的优先地位,才实现了突破性的发展。

不过,中国经济的确在前 30 年错过了一次全球经济大趋同的机会,①未能实现对发达经济体的赶超。如果简单地从表面数字观察,计划经济时期中国经济增长率似乎差强人意。根据经济史学家安格斯·麦迪森(Angus Maddison)按照 1990 年国际购买力平价美元构造的数据口径,1952—1978 年期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GDP)的年均实际增长率为4.4%。但是,由于 20 世纪 50 年代以后,很多后起国家和地区以较快的增长速度实现了对发达经济体的赶超,在同一时期,被定义为“富裕国家”的经济体的总体增长率达到 4.3%,而不属于该组别的“其他国家”(主要为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国家)总体增长率高达 4.9%,世界平均增长率为 4.6%。②

在这期间,由于一些原来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国家(地区)的人均收入向“富裕国

① 斯彭斯认为,全球经济大约在 1950 年步入了一个大趋同的时代。参见 Michael Spence, *The Next Convergence: The Future of Economic Growth in a Multispeed World*, New York: Farrar, Straus and Giroux Publishing, 2011。

② 安格斯·麦迪森著,伍晓鹰、马德斌译:《中国经济的长期表现——公元 960—2030 年》,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8 年版,第 108—109 页。

家”靠近,而中国没有跟上这个潮流,所以中国与世界的差距反而拉大了。根据上述数据来源,1952 年中国的人均 GDP 仅为 538 美元,为“富裕国家”平均收入水平的 8.7%、“其他国家”平均收入水平的 46.5%以及世界平均收入水平的 23.8%。由于中国人均 GDP 增长速度均低于上述组别,到 1978 年,中国人均 GDP(978 美元)相当于这三个组别平均水平的百分比反而下降,分别为 6.8%、42.1%和 22.1%。

事实上,由于冷战以及由此产生的世界经济体系的分隔,迈克尔·斯彭斯(Michael Spence)所说的那一轮所谓全球大趋同,其实是范围十分有限的现象。真正实现了对先行国家赶超的仅仅是欧洲一些相对落后的国家和日本、亚洲四小龙等经济体,而并没有包含更广泛的发展中国家。只是自 1990 年以来,新兴经济体和众多从计划经济转型的国家实行开放政策、深度参与了新一轮经济全球化,才出现了全球范围的趋同现象,使世界经济格局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① 中国正是这一轮经济全球化的积极参与者和获益者,在 40 年里对发达国家实现了奇迹般的经济赶超。

世界经济中的组成部分,即每一个国家或经济体,理论上都以自身状况的改善或恶化对整体产生影响。然而,要真正产生实质性的影响,这个作为整体组成部分的经济体需要有足够大的总规模和占比。进入 21 世纪的中国经济,以其高速增长以及作为结果的规模扩大和占比提高,对世界经济产生越来越大的影响。

如果说这种产出贡献是以一种私人产品的方式对世界经济做出贡献的话,得以达到这样一种绩效的发展经验和发展理念,以及随之而来的对规则制定的话语权、对发展观念的有益见地和对循例的建设性挑战,都属于对世界经济的公共品贡献。中国并不谋求世界经济霸权,也不输出自己的发展模式,但是,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第一大工业国、第一大货物贸易国以及第一大外汇储备国,中国义不容辞地要代表广大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表达关于国际经贸规则的诉求,及至引领全球化治理方式的转变。

不仅如此,由于以下几个突出特征,中国及其发展对于世界的意义尤其重要。首先,中国拥有世界上最大规模的人口,2017 年约为世界总人口的 18.5%,占人类 1/5 的中国人民创造的成就对世界的显著意义,是其他国家所无可比拟的。其次,知识分子天生具有探索兴衰之谜的学术好奇心,而吸引众多学者尝试回答的关于中国科技(发展)为什么由盛至衰的李约瑟之谜,正是经济史学中同样著名的、旨在探索为什么 16 世纪以来世界经济发展出现大分流这一谜题的中国版本。最后,就满足相同的学术好奇心而言,中国是迄今为止唯一经历了经济发展由盛至衰再至盛,同时接近于完整经历经济发展的每一个必要阶段的发展中国家。

---

① 蔡昉:《全球化、趋同与中国经济发展》,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19 年第 3 期,第 1—15 页。

利用麦迪森构造的长期历史数据,并力图按照相同或相近的口径予以更新,我们在图 1 中显示:在长达两千多年的时间里,以 GDP 占全球经济的份额、人均 GDP 相对于世界平均水平的百分比所表示的中国经济的世界地位,经历了一个明显的 V 字形变化轨迹。值得特别注意的是,图中显示的中国经济由衰至盛的后半程,无论从时间之短暂还是从规模之巨大来看,这个奇迹都是古今中外所罕见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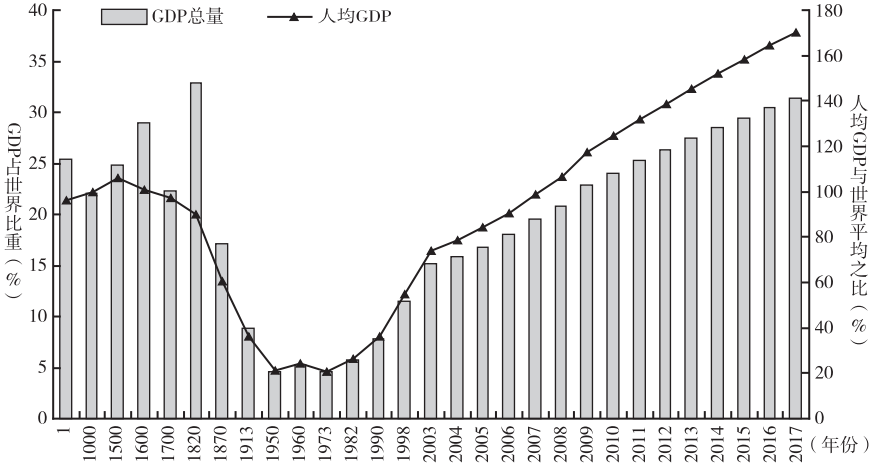

图 1　中国经济发展的由盛至衰和再至盛

资料来源:2003 年之前数据取自 Angus Maddison, *Contours of the World Economy, 1-2030 AD*, *Essays in Macro-Economic Histor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p.379, p.382;2004 年以后数据系在 2003 年数据基础上,按照世界银行不变价国际美元 GDP 的相关增长速度推算,参见世界银行数据库,http://data.worldbank.org/,访问时间:2019 年 3 月 18 日。

二　世界经济发动机和稳定器

从经济规模来说国家有大有小,从增长表现来看国家有成有败。在过去 70 年的经济发展过程中,中国经历了起伏跌宕,有失败的教训,更有成功的经验。自从 40 年前开始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步履稳定地成为世界上独一无二经济规模足够大、增长速度足够快、不仅改变了自身的面貌也改变了世界经济格局的国家。可以说,中国以其世界经济的发动机和稳定器的作用,促成了全球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第一,中国经济以其总规模、在全球的位次和世界经济占比,对世界经济做出显著贡献。根据世界银行数据,以 2010 年不变价美元计算,中国 GDP 总规模在 1978 年为 2943 亿美元,在全球排第 14 位,仅相当于全球经济总量的 1.1%和美国经济的 4.6%。

到 1990 年,中国 GDP 增加到 8296 亿美元,在世界经济占比提高到 2.2%,为美国的 9.2%,超过了墨西哥、澳大利亚、荷兰和沙特阿拉伯,排在世界第十位。在随后的十年里,中国经济规模先后超越了西班牙、加拿大、巴西、意大利和英国,于 2000 年排到世界第五位,总量达到 2.24 万亿美元,占世界经济比重为 4.5%,为美国的 17.6%。中国于 2010 年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总量达到 6.1 万亿美元,占世界经济的 9.2%,相当于美国的 40.8%。及至 2017 年,中国 GDP 达到 10.2 万亿美元,在世界经济中占比为 12.7%,相当于美国的 58.7%。

第二,随着体量的增大和保持全世界持续时间最长的高速增长,中国经济增量的显著性逐年提高,中国经济对世界经济增长做出巨大的增量贡献。例如,中国 GDP 的年度增量在 1990 年已经超过诸如越南、卢森堡和肯尼亚这样一些国家的 GDP 总量,2000 年超过以色列、尼日利亚和爱尔兰等一些国家的总量,2010 年超过瑞士、沙特阿拉伯和阿根廷等一些国家的总量,2017 年超过荷兰和波兰等国乃至全部低收入国家合计的总量。如果说在 20 世纪 90 年代以前,中国对于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微不足道,甚至在改革开放之前还常常“拖累”世界经济增长的话,1990 年以后中国经济对世界经济的增量贡献就超过了 10%,2008 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则始终保持在 30%左右。

第三,由于中国 GDP 年度增量逐渐扩大,自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其在世界经济增长中的贡献显著提高,特别是由于与世界其他地区相比中国经济增量的高度稳定性,中国经济作为世界经济稳定器的作用变得越来越突出。从年度增长率来看,与世界经济增长相比,早期的时候中国经济增长波动大,但是,由于总量和增量都较小,对世界经济整体的影响并不显著。然而这个特点逐渐发生了变化。

在图 2 中,我们把中国经济的年度增量,分别与不包括中国数据在内的世界其他地区经济增量,以及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经济总增量进行比较。从中可以发现,在有和没有中国经济增长这个因素的情况下,世界经济增长的稳定性是迥然不同的。比较包括和不包括中国数据情况下的世界 GDP 年度增长率的方差,可以看到自 1990 年开始,这个效应已经有所显现。之后随着中国经济年度增量的逐步扩大以及稳定性越来越强,中国经济增长对于稳定世界经济增长的作用愈显突出。特别是在 21 世纪世界经济异常波动的年份,正是由于中国经济的稳定作用,全球波动性才得以显著降低。

第四,以中国为代表的更多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的经济赶超,使得长期只在理论上讨论的趋同的可能性,终于开始成为全球经济的现实。与此同时,作为经济趋同的结果,发展中国家人均收入水平大幅度提高,全球绝对贫困人口规模和贫困发生率前所未有地下降了。可见,中国改革开放带来的发展和分享,产生了提高城乡居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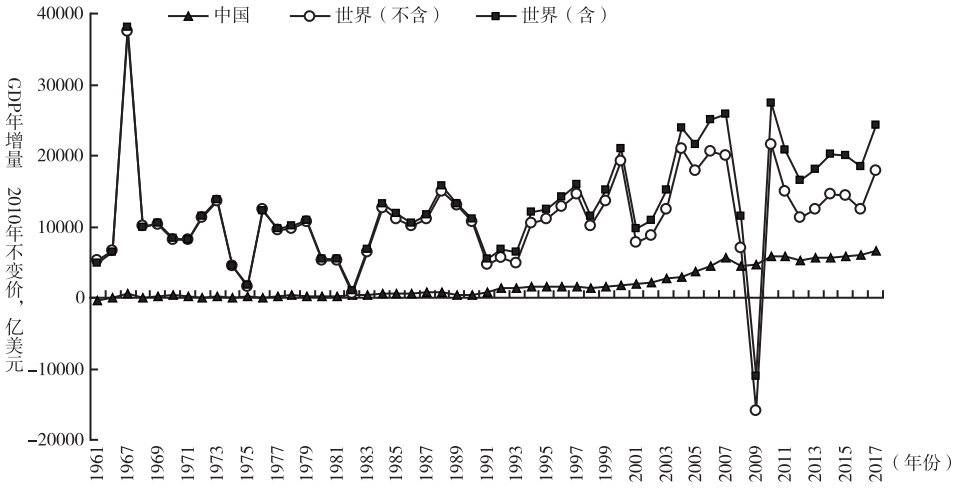

图 2　中国经济年度增量及其对世界经济稳定的贡献

资料来源：世界银行数据库，https://data.worldbank.org/，访问时间：2019 年 3 月 18 日。

收入的整体效果，从而大幅度减少了贫困，对于全球减贫做出巨大贡献。此外，中国绝对贫困人口的减少，对全球贫困人口的减少做出数量上的直接贡献。

根据世界银行数据，1981 年全世界生活在世界银行绝对贫困标准（按 2011 年购买力平价计算每天低于 1.91 美元）以下的人口共 18.9 亿，中国为 8.8 亿，占全球贫困人口的 46.4%。2015 年，全球贫困人口减少到 7.5 亿，中国则只有 960 万，仅为全球贫困人口的 1.3%。这期间，中国对世界减贫的贡献高达 76.2%。实际上，2015 年之后中国按照高于世界银行标准实施农村脱贫攻坚战略，分别于 2016 年、2017 年和 2018 年减少农村贫困人口 1240 万、1289 万和 1386 万，可以说中国总体上已经消除了世界银行标准下的绝对贫困现象。

三　寻找经济发展的基本条件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众多国家纷纷走上独立发展的道路，尝试进行各种改变贫困面貌的探索。经济学作为一门经世济民的学问，也因应这种现实的需要，于 20 世纪 50 年代形成以广大发展中国家为对象的发展经济学。各种关于发展的理论假说和战略主张一度层出不穷、花样翻新。虽然一些原来经济落后的欧洲国家以及日本和亚洲四小龙等经济体，对发达国家实现了较快的赶超，但直到 20 世纪 80 年代，世界经济范围内并没有表现出经济学家预想的趋同现象。或者说，人们从那个时期所能观察到

的,充其量只是条件相似的经济体之间的“俱乐部趋同”或少数经济体的赶超现象。

在寻求为什么发展中国家赶超失败,因而世界范围的贫困问题未能有效解决的原因时,人们也对流行的发展理论进行了反思。一些发展经济学的先驱们纷纷进行自我辩护,[①]另外一些学者则旨在否定先驱们的理论立足点,试图揭示发展经济学本身的“贫困”。[②] 最终的结果则是发展经济学作为整体,被冷落到角落里。相应地,新古典经济学逐渐成为主流,其中新自由主义思潮更是大行其道,对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战略、转型中国家的改革策略、国际和区域发展机构以及发达国家的援助理念产生影响。然而,这些理论和理念,既没有以正确的认识论引导各国找到适合自身的发展道路,也未能帮助寻求发展的国家找准自身发展的基本条件。

在东西方冷战和南北方割裂的时代,中国没有与西方国家和国际援助组织发生密切的联系,而是在独立自主的环境中探索发展之路。改革开放之后,中国与各国发展贸易、引进外资,也与世界银行等国际机构建立了合作关系。然而,中国从改革伊始,便没有接受任何先验的教条,即不照搬任何既有的模式、道路或所谓共识,而是服从于发展生产力、提高国力和改善民生的根本目的,坚持了渐进式改革方式,秉持了改革、发展和分享理念。

概述中国改革开放发展分享的过程,可以看到其中体现的逻辑,进而可以提炼出一个寻求赶超的国家,应该如何发现并遵循哪些必要的步骤,创造出必要发展条件的智慧。由于这些创造必要条件的步骤都与经济体制改革紧密相关,所以改革又是实现增长的充分条件。

第一步,激活“点石成金”的激励机制。西奥多·舒尔茨(Theodore Schultz)有句名言:一旦有了投资机会和有效的刺激,农民将会点石成金。[③] 实际上,“把激励搞对”已经成为关于经济转型的教科书式的信条和建议。然而,这种一般性的说法,或者简单把问题归结为是否存在私有产权制度,并无助于抓住中国计划经济体制弊端的要害。

在实施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的条件下,为了抑制农产品价格,以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作为工业化积累的手段,就需要形成农产品统购统销制度。为了保证农业中生产要素不致流失,把生产要素特别是劳动力严格限制在农业活动中,人民公社制度和户籍制度便应运而生。这一制度“三驾马车”造成资源配置的扭曲、农业生产的低效率和劳动的激励不足。在改革前夜,这种体制弊端达到了顶点。1977 年全国人均拥

---

① Gerald M. Meier, *Leading Issues in Economic Development*,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5.

② Deepak Lal, *The Poverty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 London: Institute of Economics Affairs, 1983.

③ 西奥多·舒尔茨著,梁小民译:《改造传统农业》,北京:商务印书馆 1987 年版,第 5 页。

有农产品产量中,粮食不到 300 千克,棉花只有 2 千克,油料 4 千克,糖料 21 千克。1978 年,有 2.5 亿农村人口年收入不到 100 元。

在这种情况下,任何能够改善农业生产现状的变革,都会得到包括农民在内的全国人民的认同。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创造了改革的政治环境后,家庭联产承包制的迅速普及就是顺应这一需求的制度变革,也是一种帕累托改进。劳动努力与产量及收入直接挂钩,以及农产品收购价格的提高,激活了激励机制,在极短的时间里就显著增加了农产品产量,大幅度降低了农村人口贫困发生率,解决了农民的温饱问题。

第二步,展开资源重新配置的库兹涅茨过程。农业中激励机制的改善,调动了生产和劳动的积极性,提高了农业劳动生产率,单位土地面积上的劳动时间显著减少,长期积淀的农业剩余劳动力被迅速显性化。这时,家庭联产承包制的另一个效应显现出来,即农民获得了自由配置生产要素特别是劳动力的权利。农村劳动力按照收入提高的信号,分别进行了经济活动领域和地域的转移。

例如,农村劳动力经历了从单一粮食生产到种植业多种经营,再到农林牧渔业全面发展的重新配置,随后又进入乡镇企业等农村非农产业就业,继而依次迁移到小城镇和各种规模的城市,从中西部地区流动到沿海地区。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农业劳动力比重从 1978 年的 70.5%降低到 2018 年的 27%。而根据笔者的研究结果,目前农业劳动力比重很可能比这个官方数字再低 10 个百分点左右。

由于一系列阻碍劳动力流动的体制障碍被逐渐消除,劳动者提高收入的个体动机与重新配置的效率驱动力得以衔接,共同推动了大规模的劳动力转移,同时在宏观意义上形成了一个资源重新配置过程,促进了产业结构的高度化。由于是西蒙·库兹涅茨(Simon Kuznets)最早揭示了产业结构变化现象背后体现的劳动生产率不断提高的本质,因此青木昌彦(Aoki Masahiko)把这个农业劳动力的转移和相对份额下降所表征的产业结构变化称为库兹涅茨过程。① 在 1978—2015 年间,中国整体劳动生产率(劳均 GDP)提高了近 17 倍,其中劳动力在第一、第二和第三产业之间进行重新配置,即劳动力从农业向非农产业转移,对总体的贡献率高达 44.9%。②

第三步,全方位参与世界经济分工体系。中国的经济改革与对外开放是同时发生的。始于 1979 年建立经济特区,先后经历了沿海城市和沿海省份的开放到全面开放;于 1986 年提出恢复关贸总协定缔约国地位的申请,2001 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

① Masahiko Aoki, "The Five Phases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Institutional Evolution in China, Japan, and Korea," in Aoki, Masahiko, Timur Kuran, and Gérard Roland, eds., *Institutions and Comparative Economic Development*, Basingstoke: Palgrave Macmillan, 2012, pp.13-47.

② 蔡昉:《中国经济改革效应分析——劳动力重新配置的视角》,载《经济研究》,2017 年第 7 期,第 4—17 页。

(WTO)。贸易扩大、引进外资和沿海地区外向型经济发展,为转移劳动力提供了大量就业机会,引导产业结构转向符合资源比较优势,也为制造业产品赢得了国际竞争力。2017 年,中国引进的外商直接投资净流入额占到全球的 8.6%,出口货物和服务总额占世界的 10.5%,总出口中有 70%是流向世界银行定义的高收入国家,反映了中国在国际贸易中发挥了中等收入阶段的比较优势。

作为上述改革开放三部曲的结果,中国经济在长达 40 年的时间里实现了年均 9.4%的增长。一方面,中国的这一成就对发展中国家对发达国家的赶超,以及世界经济的趋同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另一方面,正是由于广大发展中国家参与这一轮全球化,新兴经济体取得了可圈可点的发展成就,世界经济有史以来首次显现趋同的趋势。1978—2017 年间,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国家的 GDP 在世界经济中的比重,从 21.3%提高到 35.3%,中国的 GDP 占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国家经济总量的比重,则从 5.3%提高到 36%。在这个时期,按不变价计算,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国家 GDP 总额扩大了四倍,其中中国的贡献高达 43.6%。

四　复兴发展经济学

歌德(Johann von Goethe)曾经说:理论是灰色的,而生命之树常青。这句话并不必然意味着理论不重要。从更加积极的角度理解这句话,可以得出的结论是:从成功的实践经验中提炼特征化事实,不断丰富乃至修正已有的理论体系,创造新的理论范式和体系,可以使理论本身生命常青。迄今为止,中外经济学家并没有浪费中国改革开放这一丰富的经验资源,并在研究探索中形成了三种研究范式:第一,中国经济学家运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原理、借鉴关于转轨国家的经济学讨论、吸收西方经济学关于市场经济的理论,形成了一系列对于中国改革开放发展的独特认识,并尝试以之指导实践。第二,国外经济学家尝试用西方主流理论解释中国经验,并试图影响中国政策制定。第三,许多经济学家也利用中国经验的独特性,对主流经济学提出挑战、修正乃至否定。

依据经济发展实践形成的新的经验,对已有各种理论流派进行重新认识、再定位和集成,从而提出替代性的认识体系,是经济理论特别是发展经济学演进的应有逻辑和源泉所在。占世界人口五分之一的中国人民所创造的改革和发展成就,就其显著性来说,当之无愧也责无旁贷地应该对发展经济学做出丰富和发展。这就需要着眼于把中国发展的独特路径予以一般化,回应其对主流经济理论或其隐含假设的挑战,同时给出既能解释自身全过程,也能为更一般的发展问题提供借鉴的理论答案。下面将对其中若干问题进行简述。

首先,是否普遍存在一个二元经济发展阶段。新古典增长理论认为只有一条道路通向罗马。埃尔文·扬(Alwyn Young)和保罗·克鲁格曼(Paul Krugman)等人孜孜不倦地批评东亚模式,唱衰中国经济增长,就是由于不承认存在二元经济发展这样一个发展阶段,也看不到人口红利可以在特定阶段成为经济增长源泉。他们先验地认为劳动力是短缺的,资本报酬递减现象是无条件的,否认要素投入可以维持可持续增长。因此,他们认为东亚经济体和中国经济的良好增长表现不是可持续的。

至于全要素生产率,将其看作唯一可持续增长因素固然没有错,但是不承认二元经济发展,也就看不到资源重新配置在这个阶段上可以成为巨大的全要素生产率源泉,甚至可以以帕累托改进的方式得到大幅度提高。囿于新古典理论假设,先验地否定二元经济发展,使得这些经济学家不光彩地使用种种统计技巧,试图否认在具有劳动力无限供给特征的经济体中全要素生产率得到改善的事实。①

不过,也有经济学家看到了经济发展并非从始至终都是索洛式的新古典增长。实际上,爱德华·普雷斯科特(Edward C. Prescott)等就尝试把马尔萨斯阶段也纳入经济增长模型中,②并暗示在马尔萨斯到索洛两个阶段之间还存在一个农业劳动力重新配置的过渡阶段。③ 笔者通过对经济史的回顾,认为二元经济的形成过程,进而二元经济发展阶段是各国经济发展过程中普遍存在的,因而可以把人类经济发展划分为五种类型或五个阶段,分别为马尔萨斯贫困陷阱、格尔茨内卷化、刘易斯二元经济发展、刘易斯转折点和索洛新古典增长。④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工业化进程大大落后于世界,农业已经长期处于克利福德·格尔茨(Clifford Geertz)所称的内卷化(involution)过程,⑤积累了大量的剩余劳

---

① 参见 Alwyn Young, "The Tyranny of Numbers: Confronting the Statistical Realities of the East Asian Growth Experience," *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Vol.110, No.3, 1995, pp.641-680; Alwyn Young, "Gold into the Base Metals: Productivity Growth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During the Reform Period,"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Vol.111, No.6, 2003, pp.1220-1261; Paul Krugman, "Hitting China's Wall," *New York Times*, July 18, 2013。

② Gary D. Hansen and Edward C. Prescott, "Malthus to Solow,"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Vol.92, No.4, 2002, pp.1205-1217.

③ F. Hayashi and E. Prescott, "The Depressing Effect of Agricultural Institutions on the Prewar Japanese Economy,"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Vol.116, No.4, 2008, pp.573-632.

④ 蔡昉:《理解中国经济发展的过去、现在和将来——基于一个贯通的增长理论框架》,载《经济研究》,2013 年第 11 期,第 4—16 页;蔡昉:《二元经济作为一个发展阶段的形成过程》,载《经济研究》,2015 年第 7 期,第 4—15 页。

⑤ 参见 Clifford Geertz, *Agricultural Involution: The Process of Ecological Change in Indonesia*,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63;黄宗智:《发展还是内卷?十八世纪英国与中国——评彭慕兰〈大分岔:欧洲,中国及现代世界经济的发展〉》,载《历史研究》,2002 年第 4 期,第 149—176 页。

动力。新中国成立之后,在实施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的条件下,“三驾马车”的制度安排阻碍了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在迅速推进工业化的同时反而形成低级化的产业结构。直至改革开放以后,库兹涅茨过程才真正开始,在调整产业结构的同时大幅度提高了劳动生产率。并且,在这个过程中,有利的人口年龄结构形成的潜在人口红利得到兑现,成为高速经济增长的源泉。

其次,在二元经济发展阶段,经济增长的源泉来自何处。主流经济学建立在新古典增长假设基础上,假设劳动力短缺是常态,虽然资本积累对于增长至关重要,却会遭遇报酬递减的制约,因此该理论体系认为全要素生产率是经济增长的唯一源泉。然而,如果我们承认并非所有的经济增长都是新古典类型,则完全可以相信存在着异于新古典类型的其他增长源泉。

在人口年龄结构具有生产性特征(劳动年龄人口增长快且比重高,因而人口抚养比低且持续下降),并且普遍存在剩余劳动力的条件下:(1)只要存在着有效的激励和动员机制,劳动力数量供给就是充足的;(2)如果教育得到发展,新成长劳动力不断进入劳动力市场,也可以显著改善整体劳动力的人力资本;(3)人口抚养比低且不断下降有利于维持高储蓄率;(4)劳动力无限供给可以延缓资本报酬递减现象的发生;(5)劳动力从低生产率部门(农业)向高生产率部门(非农产业)转移,可以获得资源重新配置效率,构成全要素生产率提高的主要部分。这些增长源泉,在新古典增长理论预期中都是不存在的。①

中国在二元经济发展阶段的高速增长,以及在刘易斯转折点到来并且人口红利消失之后的增长减速,都证明了这种独特增长源泉的存在。许多计量结果都证明了存在二元经济发展所具有的独特增长源泉。例如,在 1978—2010 年间,劳动年龄人口迅速增长,人口抚养比持续下降,估计表明,其间年均 9.9% 的 GDP 增长中,劳动力数量的贡献率为 9%,人力资本的贡献率为 6%,资本积累的贡献率为 61%,资源重新配置效率的贡献率为 8%,其余未能解释的残差(资源重新配置效率之外的全要素生产率)贡献率为 16%。②

根据这种生产要素供给和配置状况可以估计得出,这一时期中国经济潜在增长率

---

① 新古典增长理论在从资本报酬递减现象推导出趋同假说的时候,其实就完全可以从同一理论假设出发认识到二元经济发展阶段的增长源泉。但是,绝大多数经济学家在面对发展中国家的现实时,都主动放弃了这种理论上的一致性。

② Cai Fang and Zhao Wen, “When Demographic Dividend Disappears: Growth Sustainability of China,” in Aoki Masahiko and Jinglian Wu, eds., *The Chinese Economy: A New Transition*, Basingstoke: Palgrave Macmillan, 2012.

在 9.7%—10.4%之间。伴随着 2010 年之后劳动年龄人口的负增长和人口抚养比由降转升,上述增长源泉显著减弱。相应地,潜在增长率也降低到“十二五”期间的平均 7.6%和“十三五”期间的平均 6.2%。①

最后,摆脱贫困陷阱与跨越中等收入阶段有何路径上的不同。在很长的时间里,关注发展的经济学家主要着眼于归纳打破贫困陷阱的基本条件,譬如达到临界最小要求的资本积累水平、发挥市场作用的体制和对外开放政策等。随着越来越多的国家最终摆脱了贫困陷阱,成为新兴的中等收入国家,发展经济学家继而发现,从中等偏上收入国家行列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进而继续提高在后一组别中的人均收入位次,是一个丝毫不比摆脱贫困陷阱容易的任务。许多研究也从经验角度揭示,确有众多国家长期徘徊在中等收入阶段,故而有了“中等收入陷阱”这一命题,并引起广泛讨论。②

中国已经十分接近经历从低收入国家经由中等收入阶段迈入高收入国家行列的完整转变过程。按照 2010 年不变价,1978 年中国人均 GDP 为 308 美元,属于典型的低收入国家;1993 年达到 1001 美元,跨入中等偏下收入国家行列;2009 年以 4142 美元进入中等偏上收入国家行列。按照现价计算,2018 年中国的人均 GDP 接近 10000 美元,意味着中国已经临近跨入高收入国家行列的门槛。中国已经取得的成功经验和仍然面临的现实挑战,有助于认识两个发展阶段的共同点与相异处。

经济学中所谓“陷阱”,是指一种超稳定均衡状态,即对于任何一个扰动造成的偏离,增长速度仍将会回到初始状态。因此,针对打破贫困陷阱,早期发展经济学家提出需要一个临界最小努力,其中最主要的条件是储蓄率达到临界最小水平。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广大发展中国家开始独立自主地发展本国经济。摆脱殖民主义的强烈愿望、赶超发达国家的急迫感以及当时苏联计划经济的成功表现,对于许多国家做出选择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即利用政府的力量加速积累,推进工业化过程。

由于这种赶超战略忽略了市场机制作用,形成封闭经济体系,在微观环节缺乏企业家活力和劳动积极性,资源配置效率低下,产业结构和技术选择背离了比较优势,使得多数国家未能成功实现赶超,各种经济发展理论饱受诟病,发展经济学本身也陷入发展困境。③

---

① Cai Fang and Lu Yang, “The End of China's Demographic Dividend: The Perspective of Potential GDP Growth,” in Ross Garnaut, Cai Fang and Song Ligang, eds., *China: A New Model for Growth and Development*, Canberra: Australia National University Press, 2013, pp.55-74.

② 世界银行的经济学家最早提出这一概念。参见 Gill Indermit, et al., *An East Asian Renaissance: Ideas for Economic Growth*, New York: The World Bank, 2007。

③ 参见 Deepak Lal, *The Poverty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 1983。

计划经济时期的中国具有很强的资源动员能力,实现了很高的资本积累率。在1953—1978年间,中国的平均积累率达到29.5%,高于世界平均水平。人力资本积累条件也优于同等发展水平的国家。然而,计划经济却不能很好地解决经济增长的另外两个必要的体制条件,即资源配置和激励机制问题,因而有利的人口因素并没有转化为经济增长源泉。只有在1978年之后,对传统经济体制进行深刻的改革,有节奏地不断扩大对外开放,才创造出增长的基本条件,实现了对低收入阶段的跨越,并迅速向高收入阶段转变。

在从中等偏上收入阶段向高收入阶段迈进的过程中,通常伴随着传统增长动能减弱的严峻挑战。在中国,人口转变过程与经济发展过程之间,以及两个过程共同形成的发展阶段,在因果关系上是互相影响的,在时间上也完全重合。因此,继人口红利帮助中国实现了长达30多年高速增长之后,2010年之后人口红利的迅速消失也不可避免地导致经济增长自然减速。

在新的发展阶段中,经济增长越来越需要全要素生产率提高来支撑,①劳动力等要素从农业向非农产业转移,改善资源重新配置效率的空间也趋于缩小,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需要更多依靠创造性破坏机制下的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② 构建这一实现创新的条件则提出更高的改革开放要求,也需要重新界定政府的职能及其与市场的关系。也恰恰在这个时候,能够带来帕累托改进的改革机会也愈益稀少,进一步改革开放不可避免地触及既得利益,在遇到阻碍的同时也带来成长中的烦恼。

所以,在这个最接近跨入高收入国家行列的关口,一个国家必将遭遇更多困难、面对更大风险,也丝毫不容徘徊和后退。以往行之有效的办法也不再能够保障迈过新的沟坎,改革、发展、稳定必须以更加协调有机的方式结合起来。从经济史上成功的经验和失败的教训来看,从这个阶段开始,应对进一步发展面临的严峻挑战,是丝毫不比摆脱贫困陷阱容易的实践,所要求的理念创新也足以构成发展经济学的一个专门分支。

五　结语和展望

中华人民共和国已经经历了70年的历程,其间的经济发展有前30年的探索及其

① 艾肯格林等发现,全要素生产率的下降可以解释特定发展阶段中增长减速的85%。参见 Barry Eichengreen, Donghyun Park and Kwanho Shin, "When Fast Growing Economies Slow Down: International Evidence and Implications for China," NBER Working Paper, No.16919, 2011, https://www.nber.org/papers/w16919,访问时间:2019年5月22日。

② 蔡昉:《不破不立、不塞不流、不止不行:以出清无效产能促进增长动力转换》,载《比较》,2018年第1辑,第1—13页。

教训,也有后 40 年的创新及其经验。无论是走过的弯路还是取得的成功,在知识意义上都是宝贵的财富,值得中国人自己珍视,也应该贡献给正在进行同样探索的其他发展中国家,并且值得写入发展经济学的最新版本。根据已经得到提炼的智慧,按照既定的方向和目标,依据相同的改革开放逻辑和路径,中国仍将继续进行实践探索,争取对世界做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首先,在时间上延续和升级经济增长动能。随着中国经济跨过刘易斯转折点,人口红利消失,二元经济发展阶段趋于结束。从增长动力的角度看,具有“低垂的果子”性质的经济增长源泉,如大规模劳动力转移产生有利于要素供给和生产率改进的效果逐渐消失,而经济增长越来越依靠新古典增长理论所预期的那些源泉,如通过市场机制下的优胜劣汰、人力资本的提升、技术创新等途径提高全要素生产率。

然而,如同许多中等收入国家的教训可以印证的那样,并非到了这个阶段,新古典经济学的教条便可以水到渠成地引领中国经济增长。所谓“中等收入陷阱”这个命题意在揭示的道理正是:增长动能的转换不是自然而然的,而是要求根据每个国家特殊的情况,创造开发新增长源泉的条件。对中国来说,这就要求在诸多领域全面深化经济体制改革。

改革的实质性推进具有提高潜在增长率的效应。通过对改革效应做出合理假设,我们可以预测中国未来的潜在增长率。总体而言,中国经济增长虽然正在逐渐减速,但是在相当长时间里,中国经济增长速度仍会高于世界平均水平,尤其会高于美国等高收入国家的增长水平。① 因此,假设美国经济以过去 20 年的趋势速度(剔除次贷危机时的两年负增长)增长,预计中国在 2035 年前后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同时,按 2010 年不变价,中国的人均 GDP 届时将超过 18000 美元。这就意味着,一旦实现对中等收入阶段的跨越,中国将成为第一个完整经历经济发展所有形态,并完成从低收入到中等收入及至高收入阶段转变的最大经济体。

其次,在空间上延伸改革、开放、发展和分享的逻辑。中国过去 40 年的改革开放发展具有一定的梯度性,即沿海地区率先改革开放,较早取得经济发展实效,实际体现了“让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在地区间发展水平差距明显扩大的情况下,两种机制开始发挥缩小地区差异的作用。第一种机制主要是市场化的,即沿海地区制造业发展产生大规模劳动力需求,吸引中西部地区农村劳动力的流入,提高了劳动者对非农产业的参与率,增加了农户收入,提高了整体劳动生产率。第二种机制更多借助政府政

① 如蔡昉和陆旸的估算,参见 Cai Fang and Lu Yang, “The End of China’s Demographic Dividend: the Perspective of Potential GDP Growth,” pp.55-74。

策的作用,即实行包括“西部大开发”在内的各种区域均衡战略,促进了中西部地区基础设施和投资环境的改善。

随着中国经济迎来刘易斯转折点,劳动力短缺在沿海地区表现得更为突出,制造业在这些地区最先失去比较优势。此时,中西部地区恰好具备了迎接产业转移的条件,遂形成“国内版雁阵模型”。① 与此同时,中国开始进行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和长江经济带一体化等区域发展布局,意在通过聚集规模经济保持制造业优势。

不过,劳动密集型产业终究会在中国丧失比较优势,仍然需要打造新的“国际版雁阵模型”,意味着部分制造业将向劳动力丰富的周边国家和非洲等地区转移。“一带一路”倡议以基础设施建设先行,进而带动产业转移,既符合雁阵模型这个一般发展规律,也为中国自身的梯度发展实践证明有效。

最后,从分享的维度上深化改革和扩大开放。各国寻求经济发展并不是因为发展本身,而是由于其带来对人民福祉的改善,因此,促进经济发展的改革与开放,只有从这一目的出发才能得到人们的肯定与欢迎。过去 40 年中国在改革开放过程中取得的伟大成就,核心也恰恰在于实现了以下三个过程的统一而具有分享性。其一,劳动力资源重新配置,保障了生产要素的充分供给,提高了整体劳动生产率,经济增长尽享人口红利;其二,把劳动力丰富的资源禀赋转化为制造业比较优势,并且在国际上获得中国产品的竞争优势,获得全球化红利;其三,大量岗位的创造使城乡就业更加充分,随着劳动力逐渐成为稀缺要素,普通劳动者获得了越来越高的劳动力市场回报。

随着中国经济进入新的发展阶段,来自市场机制本身的收入分配改善效应将会减弱。在经济增长模式从投入型转向创新型的情况下,生产率提高的源泉也从产业之间的资源重新配置转向经营主体之间的优胜劣汰,创造性破坏机制的作用必将增强;在更高的发展阶段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与发达国家之间的竞争效应会大于互补效应;改革开放越是深入,帕累托改进的空间越小,可能遇到的既得利益阻碍越多。这些都要求在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的统领下,把分享性体现在进一步改革开放发展的全过程,同时加大政府再分配力度,发挥社会政策托底功能。

(截稿:2019 年 5 月　编辑:肖　河)

---

① Qu Yue, Cai Fang and Zhang Xiaobo, “Has the ‘Flying Geese’ Phenomenon in Industrial Transformation Occurred in China?” in Huw McKay and Song Ligang, eds., *Rebalancing and Sustaining Growth in China*, Canberra: Australian National University Press, 2012, pp.93-109.